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 大西南区域文化的发展及其文学呈现

陈 辉 朱寿桐

[摘要]大西南地区由于相似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传统,形成了大西南区域文化共同体,它使西南各民族群体具有了相近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凝聚而成的共有的历史观、家国观、民族观、价值观。建构与阐释大西南文化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巩固,它以区域文化的整体特征和地方活力有效充实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上,大西南文化可分为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和藏文化。巴蜀盆地是中原文化推移中的“太极眼”,对巴蜀以外的西南地区推化文化影响辐射,进而促进大西南地区文化交流互融,走向区域文化一体化。在当下,奇绝的审美价值与坚韧的文化品质,是大西南地区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突出的文化贡献。

[关键词]大西南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大西南文学;文化推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5)04—0167—07

作者简介:陈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四川 成都 610066 朱寿桐,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澳门 999078

大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在这一地理区域中,主要分布有 30 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壮、苗、彝、土家、藏、侗、布依、瑶、白、哈尼、傣 11 个少数民族。同时,大西南属于高原山地地形,地貌形态多样,林业、矿产、江河资源齐备,形成了独具区域特征的山地农业类型。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下,大西南地区培育出的文化形态缤纷多彩,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从而形成了一个既依附于中原文化又极富个性的次生文化区块。再加之大西南地区在先秦至盛唐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融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其历史发展与文化特征十分符合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

“多元一体”理论大抵被认为是一种生成论,它强调“多元”,在逻辑上更能论证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因此,就大西南而言,“多元一体”理论更愿意将大西南区域文化特征叙述为民族性与多元化,以此“认为不同且多样的地方民族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

质的稳定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2]这一叙述固然符合地方民族汇聚为“一体”的国家族体生成史,但忽略了国家结构中“一体多元”的国体建构。并且,更为紧迫的是,在具体的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叙述中,由于叙述者强调民族特色、族群意识、边缘身份与地方知识,并在全球东方主义话语与意识形态正确的加持下,对多民族区域文化的叙述越来越偏向于多元化,而忽略了多民族地区中各民族的交流与互融,从而形成的整体性文化特征。正如学者马戎指出,“这样刻意地寻找各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忽略或无视客观生活中各族分享的‘文化共性’,”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形象与“共同文化”具有消极作用^[3]。

因此,在强调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阶段,从“一体多元”而非“多元一体”的角度考察大西南区域文化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这不是单纯地置换某一新兴理论,或否认“多元一体”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对这一理论的再次深化与认知拓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人们才能发现在“一体”的宏观历史叙事中,地方之间、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和某一地理

区块逐步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大西南地区从自然地理板块到区域文化内核,本身便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特征。对大西南地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与阐释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巩固,它以区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和地方性活力有力地充实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也正因为诸如大西南等地理板块的各个区域文化的支撑,中华文化才得以成为一个“丰富的实体”。本文通过探究大西南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文化动力机制及其具体的文学呈现,以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大西南文化也以自古以来的奇绝审美价值与近现代以来的坚韧文化品质,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大西南区域文化成立的各方面因素

某一地理区域要形成结构相对稳定的区域性文化共同体,不仅取决于这一地理空间内的自然地理特征,还取决于这一空间内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西南地区作为中国七个地理分区之一,虽远离中原文化地区,但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其具体的地理范围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清晰拓延。“西南”作为方位名词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4](P.391)},“西南有巴国”^{[4](P.395)},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南方向上的边界模糊的广袤地带。西南地区有明确的地域指向,则最早见于司马迁著写的《史记》。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提出了“西南夷”这一地理概念^{[5](P.364)},其具体指向为巴蜀核心地区以外西南方向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学者宋蜀华认为,这一地区“主要是指云贵高原和四川的大小凉山地区”^{[6](P.92)}。

现代意义上的大西南地区是在传统“西南”“西南夷”基础上的一种拓延。一般认为,大西南所覆盖的地区应该比“西南夷”的范围更广,除了传统区域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以外,还应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甚至包括与重庆、贵州毗邻的少数民族地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近年来,基于大西南文学框架的大西南地区超越了以往相对稳定的行政地理范围,而日趋被认定为一种边界模糊的文化区域。实际上,传统中国理解的“华夏”“四夷”,包括“西南夷”,主要是基于文化区隔特征的一种地域划分,这种文化地域划分在具体

的地理范畴与接壤边界上本身就是模糊的。而现代意义上的大西南地区之“大”便体现了这种模糊性,它不仅是对西南地区地形的一种科学的深入认识,将相似及延伸的地理环境作为考察对象;还是对西南区域文化包容性的一种承认,深厚文化本身便具有延展归化功能。正如王贵禄所言,“文学的边界毕竟不同于行政区域的边界,文化的交叉性、渗透性使文化的边界具有模糊性,”^[7]因此,文学文化及其文化区域不可能具有明确的界限,这是对文化及文学本质的一种尊重。

地理地形上,基于文化包容性的大西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它处于中国大陆的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主要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三大地理类型。整个地区内高山林立,河流纵横,群山之间还镶嵌着少量的平坝地区,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形,加之在气候上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与高山气候为主,自古以来便形成了盆地水田农业、坝子农业、垂直农业、高寒河谷农业等多种农业形态。正由于大西南地区高山林立、农业类型多样,在大西南区域文化的大体系中,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才得以生长保留。

近现代历史上,传统的西南地理概念演变为现今的大西南地区,直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政治形势。1937年7月以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大西南地区乃是中国抗战的最后屏障,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内迁与学生、教师、知识分子向大后方转移,带来了大西南地区期刊报业的发展高潮。1939年底,迁往及创刊于大西南地区的各类期刊报纸都提到了“大西南”这一概念。期刊《西南青年》《战时教育》《广西教育通讯》《抗战》《时代批评》《大公报》《时事类编》与报纸《大公报》重庆、桂林、香港各版等,都发表了大量标题中含有“保卫大西南”字样的时政文章;期刊《音乐与美术》《少年战线》《歌咏岗位》等也纷纷转载了桂林音乐家陆华柏创作的群众歌曲《保卫大西南》;期刊《天下》1940年第15期刊载了多张反映“保卫大西南”群众活动、街头演讲的时事照片;现代漫画家张謇于1937年创刊并主编的《漫画战线》与于1941年出版的《漫画自选集》都收录了大量主题为“保卫大西南”的时政漫画。可见,随着“保卫大西南”主题的各类文艺作品的发表,大西南已经有了自己初步的整体形象,它成

为一个能够带给中国人希望与坚韧的最后根据地。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进行题为《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的演讲时,就将大西南称作“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8](P.388)}。自此,人们便将大西南的地理范畴与抗日大后方联系起来。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进到大西南地区。1949年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1949年11月至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盘踞于大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时代》《新中华》《华中文汇》《经验交流》等期刊报纸从1949年至1951年刊载了“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等实时报道。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管辖西南地区诸省。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拉萨。“西藏解放了,整个大西南解放了。至此,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全部解放了。”^{[9](P.405)}可见,西藏理应划入大西南地区。在近现代历史上,大西南地区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军事地理单元,它于抗日战争时期被视为顽强、坚韧的形象,于解放战争时期被视为胜利、希望的象征。

政治经济上,鉴于西南诸省经济条件的相似性,大西南地区很早就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经济发展单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出于稳固大西南与支持经济发展的综合考虑,便提出了“西南大开发”^{[10](P.292)}战略。改革开放以来,1983年底,我国开始提出“开发大西南”的经济发展设想。其基本设想是“三省四方”^[11](即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加重庆市)经济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发展。随后,“三省四方”逐步演变为“四省五方”(加上广西)、“五省区七方”(加上西藏、成都)、“六省区市七方”(重庆升为直辖市)。2012年以来,国家加强了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跨省区的各类区域经济纷纷出现,大西南地区效仿“长三角”“珠三角”“中三角”等经济圈模式,陆续实现了“四川盆地经济圈”“成渝西昆贵菱形经济圈”“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12]等经济战略设想。“大西南经济区”及一系列经济圈的提出与形成使大西南诸省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大西南诸省在彼此认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贯彻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战略,相互依存,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了具有较高自足性、完整性、独立性的区域生态环境。

大西南地区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层面皆可

被视为一个区域整体,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内在的文化联系。大西南以本土的高原山地文化为基础,在与外部地区的长期交流中,整合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形成了具有混合气质的大西南区域文化。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兴起以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大西南文化的特殊性。从顾颉刚1928年组织《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到杨成志1932年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创办《西南研究》、兴起“西南研究”,再到江应樑1948年提出“西南学”的构想^[13],老一辈学者多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考察西南地区之社会民族,部分涉及对大西南文化的研究,但缺乏整体性的文化共同体的视角。2002年,专著《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李怡、段从学、肖伟胜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首次提出了“大西南文化”的概念。2015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大西南文学论坛”更加正式地确立了“大西南文学”的命题,并以此带动着“大西南文学”研究^[14]。此命题虽以文学为后缀,但先天地持有超文学的大区块的文化研究立场。自此,大西南区域文化概念、大西南区域文化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二、“太极眼”文化动力辐射与三种地域文化形态

大西南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体,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与智慧。大西南区域文化共同体是大西南地区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的基石,是充实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有效实体。“在国内交流中,中华文化是多元的、分型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显现。而在对外交流中,中华文化是一体的,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少数文化,亦或是地域文化,均以中华文化展现,代表的是国家的整体形象”^[15]。而中华文化与大西南区域文化则是一体多面的关系,大西南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大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体现,是中华文化中大西南地区各民族深度交融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典型。聚焦区域文化,探究区域文化的历史发展、内在结构与动力机制,是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大西南地区多民族互聚互融,大西南区域文化一体化,是在经历几千年的风雨患难中形成的,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某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有着根本不同。中华文化有其发源地与核心区,它经历了从“三皇五帝”至秦朝建立的多次社会变动,众多部族在这多次变动中相互接触、联盟兼并,从而形成了华夏与四夷互动融合的基本格局。而后,在秦朝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原文化的涤荡推化作用与地方部族“见贤思齐”式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及其维系枢纽的中华文化得以凝聚形成。而大西南区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涤荡作用与文化认同心理下,逐渐趋附于华夏文化,从而融结成文化整体。在大西南的地区格局中,最先接触华夏文化并推化文化影响力的是巴蜀盆地地区。这一判断并非是无中生有,而有着确切的历史依据。杨义先生在分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机制时曾指出,中华民族的一条黄河、一条长江使南北方民族在接触碰撞时,有了更大的缓冲空间。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这样的多民族大融合中,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它深刻影响着周遭地理板块的文化发展走向。一方面,周遭地理板块在吸纳、化解这一文化“冲击波”;另一方面,这股“冲击波”又受到周遭地理板块区域文化的深刻影响。随着南北文化涤荡及其与周遭地理板块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圈也在越扩越大。同时,杨义先生指出,在中原南北方文化交融形成的“冲击波”与周遭地理板块之间,存在着“一东一西两大行使文化推移作用的‘太极眼’”,这便是西部的巴蜀盆地与东部的环太湖流域^[16]。此论对巴蜀盆地“太极眼”的定位可谓眼光独到,它十分准确地揭示了大西南区域文化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在此论基础上,下面对巴蜀盆地“太极眼”推移机理与地域文化具体形态进行阐释。

“太极眼”又称“太极鱼眼”,太极阴阳两极相互推移,相反相成,永远蕴涵着动与静两种势能,而阴阳“太极眼”至关重要,决定着阴阳两极的推移方式与推移方向。巴蜀盆地与环太湖流域基本位于同一纬度线上,并且处于秦岭—淮河流域附近,它们在各自的地理区域中,起到了重要的文化辐射作用。巴蜀盆地中的成都平原是大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地区,其农业类型属于季风型水田农业,农作物通常是一年两熟至三熟,肥沃的

土地与丰富的物产使其获得了“天府之国”“天府粮仓”的美誉。从地区历史的角度考察,巴蜀盆地是大西南地区中最早融入中原政权的地区,其后也多次成为促进中国“大一统”的重要力量。早至公元前12世纪,巴蜀盆地的巴与蜀两个地方政权就曾帮助周武王发起对商朝的兼并战争,《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17](P.6)}。巴蜀地区的士兵在伐纣战争中表现得十分积极英勇,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原政权的统战对象。在公元前5—4世纪,巴、蜀开始与秦国、楚国接触,多方之间相互联盟攻伐。在接下来15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出了5位能人。张仪,主要的征服设想者;司马错,这一设想的军事执行长官;张若,政治管理官员;李冰,伟大的水利工程师;文翁,有名的教育家。”^[18]中原王朝逐渐实现了对巴蜀地区的征服与文化统合。至公元前2世纪,巴蜀盆地在吸收外来者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上,使巴蜀文化达到了顶峰。当文翁担任四川地方郡守时,他一方面选拔遣派地方基层官员去汉王朝首都长安进行学习,另一方面组织儿童去学堂就学。至此之后,巴蜀盆地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并且,秦朝能完成中国统一,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秦惠文王时期占据了巴蜀地区,从而拥有了广阔的地理战略与丰富的物产粮食,以此支撑秦并六国的统一战争。在往后的朝代更替中,巴蜀地区都有力支持着国家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因此也出现了“得巴蜀者得天下”的说法。

司马错在与张仪争论秦国先伐蜀还是先伐韩问题时,指出:“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19](P.8)}。在先秦时代,与三星堆文明相关的巴蜀地区似乎未形成强势的文化体系,但对西南边域仍具有统摄作用。随着秦国征服蜀国、经营巴蜀地区,由此带来的中原部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人口迁徙,巴蜀盆地成为大西南地区中最早且最深度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域,巴蜀文化也成了大西南地区中最早融合继而最早推化中原文明的中介性文化。因此,可以说,巴蜀盆地是中原文化推移中的“太极眼”,是地块结合处的文化中介地区。而巴蜀盆地西南方向以外的地区在保留自身本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接受着作为中介的巴蜀文化的“第二度辐射”^[16]。巴

蜀以外的西南地区自古便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接纳了北方古羌人部族的南下、东方三苗部族的南迁与其他北方种族的迁入。正是在长期的部族迁徙与文化叠加当中,西南少数民族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他们既保留了自己部族的文化习俗,又以各自的方式接纳着巴蜀地区推化的中原文化。加之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更替与汉族人口的迁入,包括巴蜀盆地在内的大西南地区持续接受着中华文化的辐射影响,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古老中原文化因素,使该地区的文化呈现出混合与多层的特征。

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上,大西南区域文化大致可分为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和藏文化。巴蜀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直接影响与创造性转化下形成的表现出历史延续性与文化辐射能力的区域性文化。鉴于其特征明显的平原型水田农业类型,巴蜀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滇黔文化由滇文化与黔文化组成,存在着共同的关于大江大河的迁徙传说与对槃瓠的图腾崇拜。滇、黔保留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多元民族文化,各种不同类型的民俗风尚与生活习惯在这里兼容并蓄,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黔地的大山鬼神文化、滇南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与滇北纳西族的东巴巫文化^[20](P.285-297)。藏文化是大西南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部分地区。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古羌人先后在汉代、唐代就与汉人接触互融。唐朝建立以来,西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据学者沈桂萍分析,其文化经济交流主要通过两条通道。其一是唐蕃古道,从唐朝首都长安出发,穿越陕、甘、青、藏四省区,到达拉萨。历史上,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走的就是这条通道;其二是茶马古道,中原地区的商品经由四川,过黔滇,最终到达拉萨。茶马古道再次证实了巴蜀盆地的中介转运作用,它既促进了大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大西南地区文化交流互融,走向了区域文化一体化进程。

三、大西南文学中的时代主题与地方表达

文学是一个地域群体精神活动的外显性标本,是区域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生活在同一个地理区块中的人们从事着相似的生产劳动,从而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这也决定着这个地域的人们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认知体系与道

德评判方式。其中的文学工作者将这里的生活体验转而诉诸于文学作品,这便是地域文学的发生逻辑。大西南文学通常被认为“是以大西南的地理人文环境为审美对象,或是以大西南的地理人文环境作为背景的文学。”^[7]因此,它与是否由大西南地区作家创作并无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作为区域文化集中体现的大西南文学应在吸收地理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与社会理想,展现大西南地区更为典型的“文化共性”。

实际上,现代文学批评家很早就注意到大西南作家作品的某些共通性。如鲁迅在《现代小说论(二)》中评述蹇先艾小说时,写道:“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21](P.113)其中表现了鲁迅对西南地区作家表达时代启蒙主题的认可,同时又充满了对西南地区的边地想象。再如文学史家洪子诚就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中国文坛的“西南边疆诗群”,此诗群包括了随军西进云贵川地区的一批青年诗人。对于他们的诗歌艺术共性,洪子诚分析道:“他们的创作有超乎当时一般水准的表现。除了个人的条件外,与他们生活的自然、人文环境不无关系……虽说他们诗的‘题旨’并无很大不同,但自然景物和民间风情成为感情的背景或投影”^[22](P.62)。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西南文联”开始设置在重庆,其机构便囊括了云贵川藏文学艺术界。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西南地区文学的共通性,以此开始逐步确立“大西南文学”的概念。

在文学寻根的20世纪80年代,鉴于大西南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特性,西南作家都积极参与了这次寻找本土文化的文学思潮。其具体行动表现为,西南地区文学协会开始组织大西南地区的文学活动。四川作家协会1986年在四川长宁县举办了“西南五省区作家联谊会”,贵州作家协会1988年在安顺市举办了西南五省区“龙宫笔会”。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地方刊物《边疆文艺》于1985年更名为《大西南文学》,这是文学界第一次提出“大西南文学”的概念。该刊旨在刊登西南作家的各类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通讯、油画等,扉页处的《该刊致读者》写出了发展愿景:“使她能迅速传递当代最新的生活气息,荟萃振兴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壮丽斗争的各种文学佳品”^[23]。这些文学活动与办刊主张足见

当时的作家、学者对建设大西南地域文学的努力。

同时,大西南文学不能仅仅作为读者观赏地域独特景观的人为装置,不能仅仅因为表现了大西南的生活经验而只受到大西南读者的欣赏与认同。大西南文学除了充分展示地域特征之外,还要超越地域性认知,真正地走出去,追求表达时代主题,“使地域文学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版图的必要构成”^[7]。对于西南作家而言,时代家国主题与地方表达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是时代共性与作家个性辩证统一的体现。西南作家只有实现了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大西南区域文化共同体才能在文学创作方面呈现出来,成为可能。例如,四川作家李劫人的突出贡献便是使时代主题与地方表达完美结合。他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一方面是典型的巴蜀地域文学,其小说以成都平原作为故事发生与人物活动的自然人文空间,塑造了邓幺姑、顾天成等一系列巴蜀人物形象,并由这些人物形象展现出巴蜀地区独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服饰风格、方言土语、茶馆文化与地方行会;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作家对时代、社会、民族、历史的深入思考,“大河小说”展现了四川地区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变化,涉及了维新运动、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四川独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邓幺姑、顾天成等人物的命运也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历经世事变化,体现出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紧密联系。时代性的救亡图存主题与地域性的人文景观表达相映成趣,成为了李劫人小说中最为出彩的部分。

再如,贵州作家蹇先艾是乡土小说家的代表,他从贵州到北京,向鲁迅求教,积极思考社会问题,寻求时代表达。其创作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大多反映了贵州人民的艰难生活,他写过贵州土地上的马夫、挑夫、滑竿匠、贩烟客、乞丐、失业青年、家庭主妇等底层人物。但同时,就如他的代表小说《水葬》,蹇先艾写对小偷执行死刑“水葬”的过程,在方言土语与山村环境的外壳上,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作者批判蒙昧礼教、批判看客麻木的时代启蒙精神。无论是李劫人,还是蹇先艾,抑或是其他想要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力的西南作家,必须经由地方表达的路径,以反映区域文化共性,以构成时代文学版图之一部分。

四、结语

大西南地区由于相似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

资源,形成了整体性的、自足性的区域文化共同体,它使生活在大西南的各个民族群体具有了相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以及凝聚而成的共有的历史观、家国观、民族观、价值观。大西南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基本特征,都与中原文化的推移作用相关,这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中华文化也正由于各个区域文化的充实而成为一种丰富多元的文化共同体。当然,大西南区域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推化作用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承接,它也对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此处仅对大西南文化为中华文化贡献的奇绝审美价值与坚韧文化品质,作抛砖引玉式的阐释。

自司马迁《西南夷列传》伊始,大西南便“不是一个自在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象征着他者、边疆、绝域殊方,其具体形象本身是“由外及内‘被西南化’的产物。”^[24]一方面,大西南的地区特征被称为境多奇绝,其区域内分布着高山、河流、峡谷、森林、草甸、平坝、溶洞等多种地质形态;另一方面,大西南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尤其是基诺族、傈僳族、水族等为大西南地区独有,造就了多元民族文化的格局。境地奇绝、文化奇绝成为人们对西南地区的“边地想象”。尽管在当下,这种地域想象在不断祛魅,人们愈加清晰地认识到西南地区的人文地理特征。但大西南集中呈现的奇绝已然变成一种审美价值,而贡献为一种常识性的审美类型。大西南区域文化拥有异常丰富的内核,学者白浩曾将其独特的美学精神总结为三点:“一是风格多元的绮丽化,二是多民族融合的多民族化,三是万物有灵式的神秘文化。”^[26]此处补充一点,在近代历史中,大西南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因其具有的战略回旋价值与丰富的物产资源,支持着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大西南在近代以来就成了中华民族大后方的代名词,具有了抵御与希望的象征意义,进而生发出坚韧的文化品质。综上所述,奇绝的审美价值与坚韧的文化品质,此两者是大西南地区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突出的文化贡献。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2] 郭台辉.“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思想战线[J].思想战线,2022(3).

[3] 马戎. 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应对 21 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J]. 西北民族研究, 2012(2).

[4] 富强译注. 山海经[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5] (汉) 司马迁. 史记(第六册)[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6] 宋蜀华. 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M]. 王筑生. 人类学与西南民族.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7] 王贵禄. “大西南文学”: 概念的合法性、出场路径及在场形态[J]. 大西南文学论坛, 2018(3).

[8]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2)[M]. 唐达晖, 整理.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9] 袁德金. 军事家毛泽东(下)[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10] 程霖, 王昉, 张薇. 中国近代开发西部的思想与政策研究(1840-194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1] 俞荣新. 1984 年, 胡耀邦提出开发大西南[J]. 福建党史月刊, 2014(11).

[12] 邓经武. 巴蜀文化与大西南文学[J]. 文艺争鸣, 2016(7).

[13] 王传. 从“西南民族研究”到“西南学”: 近代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思历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5).

[14] 白浩, 李婷. 首届“大西南文学论坛”综述[J]. 大西南文学论坛, 2016(1).

[15] 徐俊六. 论少数民族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J]. 民族文学研究, 2023(3).

[16] 杨义. 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J]. 民族文学研究, 2012(1).

[17] (东晋) 常璩. 华阳国志新校注[M]. 刘琳, 校注.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18] 郑德坤. 四川的古代历史[J]. 四川文物, 1999(6).

[19] 缪文远编. 战国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0] 胡兆量, 阿尔斯朗, 琼达等编.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1] 鲁迅. 现代小说导论(二)[C]. 蔡元培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22]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3] 该刊致读者[J]. 大西南文学, 1985(1).

[24] 徐新建. 西南文学与文学西南——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大西南文学[J]. 大西南文学论坛, 2016(1).

[25] 白浩, 李婷. 西部文学的主体危机与大西南文学的美学自立[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收稿日期 2025-02-15 责任编辑 申 燕